

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创生逻辑

——“现代学”的中国叙事和文明进阶

刘占虎

（西安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现代化思想是对人类社会“现代现象”的知识诠释，是对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理论确证。近代以来，中国在“中西古今”的知识革新和历史变革中融入世界历史进程，经过跨越百年的实践探索和时空萃取形成重释“现代学”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一是对“现代现象”的思想认知历经从时间意识到历史思维的时空拓展，并以文明进阶的未来学向度展开具有历史总体性的思想观照和思维前瞻。二是对“现代化”的建构逻辑历经从单一面向到总体革命的内涵拓展，重在以“人的现代化”叙事开启重撰人类“现代性”的发展视野。三是在“现代学”的知识建构上历经从西方范式到中国方法的视域转换，为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局提供具有总体性历史思维的中国理论范式。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出场，历时性表明：中国置身于“现代性”生成的历史场域，以“他者”的视野观照西方现代化历程及其“知识结构”的历史逻辑，并以“在者”的“历史作者”的身份主动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和实践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崭新叙事结构，意味着有必要从“大历史观”视野阐明并证成中国式现代化由“实体”上升为“思想”的创生逻辑和知识形态。

[关键词] 现代性；现代学；中国式现代化；时空坐标；历史思维；知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 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26)01-0016-09

[DOI] 10.16783/j.cnki.nwnus.2026.01.002

人类走向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历时性革新，其中伴随着全方位的结构变革、社会变迁及思想转型。面对这一全新的“现代现象”和人类生存境遇，人文社会科学对此作出多维度的思想阐释和知识论证。总体来看，现代化思想是对复杂“现代现象”的知识诠释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确证。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思想成熟是理论自觉和辩证实践的思维前提。“对任何科学的最初的批判都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1] (P255) 对作为实存的现代化思想展开的前提性批判和历史性审思，意在澄清人类现代化之于人的生存秩序和幸福生活的总体性建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置身于经济全球化主导的“现代性”场域，通过以“他者”的视野观照西方现代化历程及其“知识结构”的历史逻辑，并以“在者”的“历史作者”的历史

主动思考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前提和实践智慧。从“现代化现象在中国”到建构“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学理吁求，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必要在发展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指导下，归纳和总结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丰富历史经验，建立起自己的一套研究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综合理论架构”^[2] (P115)，即在知识形态上有别于西方知识论的“新的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到“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时代出场，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概念范畴体系化创新的基础上“创造了现代化的崭新叙事结构”^[3]，彻底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此，有必要从哲学基础理论对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演变逻辑和发展形态展开贯通时空的学理透视，意在从“大历史观”的时空视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实体”并上升为“思想”的创生逻辑。

[收稿日期] 2025-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现代化思想演变逻辑和发展形态研究”(22BKS068)

[作者简介] 刘占虎（1983—），男，陕西佳县人，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研究

一、从时间意识到历史思维： 透视“现代现象”的思维坐标

“现代现象”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客观实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当代人”基于特定时间意识而对人类生存镜像作出的现实审思和意义界分。如果说“世界”是时间和空间的聚合体，那么，人们对“世界”本身的“理解”必然嵌入特定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思维。抛开历史叙事之“过去—现在—将来”的单线性叙事，人类作为自身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总是以“此在”的坐标点来审思人类生存境况之“上下左右”的“周遭世界”。其中，嵌入的“空间感”是随着思维认知的拓充而伸缩的，作为线性思维的“时间尺度”也会因为人们体认度的差异而呈现出具有历史性的拉伸感。理解“历史”本身，意味着对时间和空间的辩证把握，由此也构成人类理解历史和界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意识。“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性(historicity)的展开，如何解释历史性就成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历史性在于建构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4]肇始于工业文明的“现代现象”是“现代人”不得不面对的存在现象，也是“当代人”基于特定时间意识的空间性体认。

现代性事业发轫于西方欧美国家，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已经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现象”。如此观之，作为诠释“现代现象”的“现代学”，总是在思维前提上附带特定的时间意识和空间思维，即西方知识界在“现代学”知识形态的生产上难免嵌入特定的意义空间。这种意义空间正是通过思想家的“世界”视野来洞察和呈现的。如克罗齐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诠释的，“厚古薄今”是一种有失公正的思维立场，而“古今中西”的历史辩证法是人类在特定的时空坐标走进历史和展望未来的现实据点。纵观近现代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在思想文化层面必然遭遇“古今中西”问题，这是因为“古今问题必然蕴含的文明间的关系，本身既有现代性自身内部的来源，也提示了超越现代性的外部可能”^[5] (P2)。近代以来，中国以“外源式”走向现代化的思想启蒙和知识重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古今中西”之辨来探寻“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并以历史性视野来探寻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之路。这一主题（主线）历史性地构成从“现代化思想在中国”到“中国现代化思想”的认知思维和历史意识。

从历史走向未来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点，是基

于特定历史意识的文明进阶。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对历史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未来的兴趣，未来才是意义所在，未来预存了无穷的意义。”^[6] (P160) 意义在场是人类在文明创造实践中使历史赋予生机的时空意向。面对西方“现代学”的诠释进路和知识形态，尽管我们以“外围的据点”来认知并加以内生化的知识切换或视域转换，但在知识结构的移植或转换中难免会因为观察坐标和意义统摄的差异而过滤掉特定的时空要素——作为知识范型本身附带的历史文化基因，即以“形而上学”的纯粹性切割作为任何历史创生本身的有机性。中国“现代学”的出场，意味着置身“现代时空”境遇的自我观察和历史创造，即基于置身“现代性”的空间场域展开具有时间意识的自我审思和意义建构。这种审思和建构不再是单纯地基于“西学东渐”的知识引进或模式移植，而是基于历史在场和思想自觉的知识创造，即以历史主动精神在时空思维的新据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文明进阶”）上展开“重撰现代性”的思想自觉（“以中国为方法”）和理论说明（“以中国为思想”）。

基于时间思维的历史主义叙事，集中体现为对传统与现代的纵向“切分”。尽管说历史叙事的“时间”呈现连续性，但人类存在基于生存境况的“时间体验”因为赋予特定的“历史意义”而呈现出某种具有文明标志的断裂点。这正是历史主义叙事中出现“传统与现代”之简单二分的思维盲区。历史主义叙事尽管注重“史实还原”，但未能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意识和总体性原则。1865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7] (P231) 对历史现象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必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最终都落脚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一般而言，基于断代史或文明段落的“切分”，尽管有助于理解人类社会历史之主题的变迁，尤其是文明进阶中的时空尺度和价值标识，但难免由于历史意识的缺场会“割弃”历史作为整体存在的生成脉络和逻辑主线。“现代化既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因此，现代化的概念就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范畴。”^[2] (P101) 研究复杂“现代现象”也就需要确立总体性的历史视野。西方“现代学”基于复杂“现代现象”的历史叙事，亦然存在历史意识的缺场。习近平对此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

现在、未来。”^[8] (PP. 281—282) 在“中西古今”多重因素复杂交汇的时代场域，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变迁尤其是现代化的思想逻辑，“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9] (P283)，运用全面的历史方法对历史社会现象进行思想逻辑的总体性分析。

现代化进程涉及社会结构变迁、规则理念革新、思维方式变革、生存方式变革等多维面向。作为时代变革中的“现代现象”本身具有极其庞杂的时空因素。同样，中国现代化思想演变和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创生是在高度聚合的时空境遇中进行的。之于“古今中西”场域中的复杂性问题，离不开具有总体性思维的“古今中外法”，即“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10] (P400) 在“古今中西”的时空据点上研究“现代现象”，不能单纯着眼“现代”的视域拓展，而研究“思想”则必须体现“历史过程”的方法论要求。

作为不断建构中的“现代学”是对“现代现象”及其内在规律的知识说明和思想诠释，旨在对现代化诸理论的总体性把握。现代化诸理论在扬弃他者或自我革新中的范式“转向”，一方面表明时代变革要求现代化理论（思想）作出合乎历史理性的跃升，一方面表明基于思想切入的意义坐标不同而割裂了“历史叙事”的整体性。这一境况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求解“古今中西”难题中普遍面临的思维障碍，也是由于功利化的立场导入而致使“意义脱域”引发的思维蔽障和认知偏狭。在现代性生长之开放性的人类文明进程中，现代化诸理论作为“尚未完成”时态的思想认知和知识形态，不仅意指现代化事业本身，而且特别指向后发现代化国家认知“现代现象”并由此展开创造“现代学”之多元知识结构的思想格局。于此，我们置身“现代现象”的时空场域，以“现实”为据点对西方现代化思想资源展开结构性的爬梳，试图解读“现代性”作为“存在之是”（“to be”）的症候，借助贯通历史整体性的时空意识展开现代病理学的思想诊断——“何以是”（“ought to be”），从而为“中国现代学”出场提供厚重的现实根基和思想底板。

作为人类文明进阶的“现代学”是扎根历史并建构未来的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关涉人类生存和发展之意义建构的未来哲学，“现实”作为意义的

在场本身就是人的思维通向“历史总体”的时空思维。这一意义上的“历史性不是绝对精神在特殊历史中的展开，与之相反，历史性在于特殊历史如何生成普遍问题和普遍精神。”^[4] 基于“现代现象”的复杂性和多重面相，无论是作为基于存在论意义上的肯定，还是作出基于“病理学”意义上的诊断，都有待于重新确立人类社会变革之于文明进阶的意义坐标。这种意义坐标主要是作为界分特定时代标识而不人为隔断历史的思想坐标，其核心是进行病理诊断而不“因噎废食”的思想自觉。如赵汀阳在《方法与问题》中指出：“在传统社会里，现实就是意义的解释界限，或者说，现实蕴含了意义。现代性切分了现实和意义，于是，意义不再属于现实，而属于不存在的梦想，而现实变成了批判的对象。现实与意义的分裂正是一种精神分裂的症状，而生活意义的困惑就成为现代性的一个症候。”^[6] (P25) 直面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危机或治理困局，是思想把握时代的问题意识。作为历史“在者”的生活意义的迷失，不仅要从作为现实的“现代现象”中予以结构性的病理诊疗，也需要从历史“作者”的认知思维上跳出二元界分所引发的“分裂”症状。这一结构性的问题意识，就是回到人类“生存”和“幸福”的主题上对人类社会变迁逻辑予以存在论分析的思想坐标，也是自觉跳出西方“现代学”在病理诊断中进行外围修复的“意义断裂”危机，即以历史意识的总体视野重新聚焦人的存在本身，以文明进阶的未来向度展开更具历史总体性的思想观照和思维前瞻。

二、从单面向到总体革命： 重撰“现代性”的理论视野

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动力系统开启了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其中引发的变革是多领域、多维度、多面向的。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1] (P10) 任何一种现代化都是物质建构与精神建构的统一，无论是作为常规的器物、制度、文化分析范式，还是基于人类生存结构、意义逻辑、幸福根基的存在论分析，都呈现出异于传统社会知识论的新特点。这些表征在“现代学”的知识论层面呈现为“一元现代性”和“多元现代化”。其中的“多元”是基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内容指称（实存之“定在”），“一元”是基于发展逻辑（实存之所“是”）的思想说明。这里的“一”与“多”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与特殊的一般性说明，也是作为人类文明发展逻辑之“道”

与发展方式之“器”的辩证分析，本质上是基于人类生存叙事和文明进阶的总体革命。

数百年以来的“现代化叙事”不仅在人类历史的纵向维度上呈现现代性的生发逻辑和衍生态势，也从社会历史的横截面上呈现重大“思想事件”之于现代思想变革的意义建构，尤其是“现代性”叙事的时空镜像。纵观西方知识界之于现代性的理论说明，我们看到西方“现代学”知识形态在诠释人类社会变革之诸现象的同时，总是附带着普遍主义的思维立场，试图将“实存样态”形而上为“存在”意义上的普遍性的知识范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企图“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P36）。在西方中心主义之“主导—从属”“中心—外围”的认知视界中，是没有其他异类的民族文化的思想地位的，当然也就不可能由此形成多元文化的知识互通和文明互鉴。换言之，知识形态基于科学性思维而彰显特定的理论权威性，在思维认知层面会引导并规训人们对“现代现象”的致思进路，尤其是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野蛮”的划分切换为“现代工业社会”与“非工业社会”的中西之别，进而从思维形态上规训人们走进现代性之生存场域的存在方式。事实上，思想作为对“在者”的形上之思，从来不会因为概念的抽象化而损失通向“社会定在”的有机性。

先发现代化国家开启现代化的方式和道路不尽相同，建构现代性的方式存在差异，但现代性叙事在思想主题和理论逻辑上是一元性的，即由于抽象化的论证而呈现出的单一面向，即基于商品经济和资本增殖逻辑的全球化叙事。事实上，“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变化”^[13]（P477），现代性的知识论证表现为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交互状态。“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14]（P309）历史地看，西方现代性叙事从来不缺乏批判性。但在“相反相成”的意义上说，内置其中的批判性思维进一步塑造了现代性的多元面相，即通过寓“批判”于“救赎”之中，以“入乎其中”的微观生活批判实现“出乎其外”的制度性辩护。马克思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结构性批判，意在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5]（P29）的思维原则中具体阐明其历史逻辑。这一回到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结构形态的哲学革命，是从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生产关系”根基上阐明社会变革和文明进阶的总体逻

辑。由此阐明经济结构变革之于观念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为历史性地求解人类“历史之谜”提供总体性的“历史科学”。于此，西方论者称马克思是“现代性谱系”中的一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集大成著述。“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所以用“资本论”来概述，是因为“资本”是洞察现代性尤其是商品经济形态的中枢，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纵观马克思之后诸多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路，有的是批判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方法论逻辑，有的是批判马克思通过“科学化研究”得出的个别观点。这些批判性论述，不乏思想锐力甚至理论洞见。若将其置于人类所生活的时代语境予以历史性的观照，就会发现片面的深刻性固然犀利，但思想坐标和理论的彻底性无以与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比肩。概括来说，西方现代性叙事的“一元性”在思想视野上尚未覆盖到人类优良生活建构的总体结构，在理论立场上未能达至发展的道义高度和人类文明进阶的未来视野。

在人类思想的星空中，马克思作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思想家，是成长于工业文明语境和西方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中的“现代人”，但其思想立场和思想定位并没有拘泥于“西方知识论”的既有阐释范式，也没有简单承袭既有的思想体系和理论范式。马克思基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绝对理念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对“现代现象”诠释上的非彻底性，回到此岸世界之“市民社会”的肌体中，通过剖析“商品”这一极具抽象性的“细胞”，在深入研究商品经济和现代大工业生产关系的思想进程中，以“消灭（扬弃）哲学”的勇气创造一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科学”，使之能够科学地解释“现存的世界”，并以变革的实践来改造不合理“现存世界”，实现朝向人的总体解放的自由王国。长期以来，马克思之于“现代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朝向未来社会的思想叙事，被误认为是另一种乌托邦主义的“宏大叙事”，故而将马克思思想排斥在“现代学”之外。也有西方论者（如哈贝马斯）将马克思视为“现代性谱系”的一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人类“现代学”的组成部分。这一认知不乏历史性的深刻洞见，但在思想定位上依旧低估了马克思的思想坐标。这是西方理论界将马克思仅视为“社会学家”^①并降格为“部门科学”意义上的“思想家”的原因之一。真理可能会被遮蔽，但无法做到谦逊。以深厚的历史意识揭示“历史之谜”的真理是建构“现代学”的

思想地平。历史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人类愈将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学问，是能够总体性诠释“现代现象”并引领人类走向光明未来的“现代学”。

西方“现代学”在“知识论”上之所以对这一“历史科学”误认或贬低，并不是由于个别研究者不服膺于马克思的思想高度，而是在某种意义上忌惮或拒斥马克思之于人类解放叙事的思想立场和革命品格。马克思尽管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在其“新世界观”和“新历史观”的形成中明确阐述“现代社会发展”的经典论断。就思想逻辑和思想品格而言，可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科学”视为朝向人类未来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肯定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历史性贡献同时，对资本主导的工业技术及其资本社会机制给予无情和深刻的历史批判，并从人类“历史之谜”的总体逻辑上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运行逻辑的内在症结。理解当代西方学者关于“现代性批判”的若干理论范式，在认知思维和思想坐标上绕不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也就是说，走进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人类“认知现代性”并“重构现代性”的不二坐标。因为只有秉持这一总体性的历史视野，才能够使朝向人类文明进阶的“现代学”叙事有效发挥“密纳发猫头鹰”的历史穿透力，又能够昭示社会文明进阶之“高卢雄鸡”的理论创造力。

思想的发展同样遵循矛盾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其中不乏充满魔性的闭环式怪圈。西方现代化理论有其深刻的地方，有论者从“两极对立思维”的庸俗论意义上指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是“宏大叙事”，而不是聚焦特定时代问题的具体分析。然而，“历史的真实性不在于等价于过去的事实，而在于过去、现实和未来的传递性是否形成关于历史性的合理解释。”^[4]作为“历史科学”的未来哲学之思，必然对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展开全方位的解构。马克思借助哲学批判并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来揭示“资本现代性”的本质，有人就从马克思批判逻辑中的诸多要素思维中找出某一个要素，给马克思的学说标签化，如“生产力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阶级斗争论”等。诸如此类误认性的论见或偏见，似乎并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学理研究的深入而退潮，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曲解的频繁回潮，不仅在思想地平上低估了马克思思想的水准，也人为制造了学理研究和实践指引中的思想内耗。尽管说思想所把握时代是一项艰深的“思在”事业，思想掌握群众是主客互动和循序渐进的

事情，但时代发展中的现实困局和问题意识总是呼唤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曙光，试图用这一“历史科学”去照亮“祛魅化”的物化世界和“赋魅化”的神秘世界。现代性事业以资本主义之“普照的光”击穿了传统道德叙事的观念框架，但基于思想懒惰而呈现出像梦魇一样的非理性主义情绪一直左右着人们思维的头脑。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风云变幻和人类面临“将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间。理解这一极其复杂结构的现代性，客观上不能绕过马克思的思想坐标，因为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依然是具有强烈现实指引意义和规定力量的未来之思。相应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真精神，重在尝试着像马克思一样思考，用彻底的思想视野把握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用贯通时空的历史辩证法审思经济社会变革与思维结构变迁的复杂规律，以“历史科学”的总体性视野为求解“人类何处去”的轴心问题梳理出较为清晰的蓝图。

为此，有必要从历史发展逻辑概述作为“现代学”的知识形态，试图从知识作为理论叙事的“最小单元”出发来诠释现代性论述及其分析范式的思想基底。从一般抽象的知识论分析过度到资本现代性和超越资本现代性的知识论差异，在历史发展逻辑的思想变革层面展现“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生成坐标。选择这一进路，不是基于思想资源的广博而故弄玄虚，而是基于“现代学”本身的复杂性并展开“分殊有别”的思想前提批判。置于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运动及其思想变革的总体视野，意在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变革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诸多理论形态入手，分析现代化思想之部门要素在各领域的嵌入-反馈的生成逻辑，以揭示何以成为“中国式”的价值立场、思维框架、国情实际、发展动力、秩序建构所蕴含的思想进步逻辑，进而阐明从“认识现代化”到“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主动意识，从文明创造的思想地平上阐明“建设现代化”到“重思现代学”的“中国思想”自主意识。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8]（P80）在实践中不断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开放的实践空间，以历史主动和思想自主的思想逻辑，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8]（P89），意味着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性时空要素需要深化认知，必然是高站位的思想视野和历史主动，使作为升级版的总体性的“现代学”能够观照结构性变革的社会现实

和复杂化的“现代现象”。

这一研究进路意在表达从单一面向到总体革命的方法论自觉。首先，自觉跳出单纯出于理论研究的单一面向，跳出就现代性之“部门现象”的单一剖析，跳出对把握“现代现象”的单一视域，尤其是跳出西方式“问诊现代性”而给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单一面向。这是因为“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是分学科的理论，忽视现代化的特殊历史内涵，过分热衷于构筑超时空的理论模式，对现代化过程没有整体概念。”^[2] (P116) 其次，自觉确立总体性的对象意识，将现代化之器物、制度、文化的“圈层结构”置于历史、文化、文明的创生逻辑中加以结构性分析，阐明现代性本身的结构性内涵以及西方现代性困局的结构性。为此，“必须把对现代化的世界性进程的整体考察当做建立综合理论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展开对各个层面的横剖面研究和专题性研究。”^[2] (P116)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进路，意在将社会实存与思想形态的变革逻辑统一到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革命性实践中来，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将思想、历史、文化、传统等人为割裂的形而上学化的观念误区，将“解释世界”的理论自觉和“改变世界”的思想主动统一到具有先进意识的时代创造主体上来。

总之，“现代学”的广博性和开放性要求将不同学科的理论范式统一到“历史科学”的视野下，用历史性思维和开放性视野审思不同知识形态之于诠释“现代现象”的合理尺度和建构意义。这一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科学”的方法论自觉，无疑是具有思想分量和雄心意志的。需要说明的是，“总体性叙事”的复归，不再是以往形而上学化的抽象叙事，其本意不出于研究者的心力和意志，而是源自研究对象之“现代性”本身的庞杂性和开放性。基于这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以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思维坐标实现“现代学”研究从单一面向到总体革命的时空思维转变，意在为重撰“现代性”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

三、从西方范式到中国方法： 重构“现代学”的中国范式

思想作为存在之思，总是以特定的生存境遇和问题意识为思维前提。思想是思维逻辑的语法呈现，总是通过特定的立场和视角来表达。对于现代化思想形态的学理研究，意味着对存在与思维之纵深视界的逻辑抽绎，既要关注作为社会实存的现象本身，也要从中抽绎寓于社会行为的观念形态，尤

其是在二者的辩证性上探析思想文化形态的变革理路。不可否认，“现代化思想在中国”与“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是两个性质迥异的表述，打通二者的关键在于回到历史逻辑中的生成论视界，加以会通时空思维的思想史研究。在重撰“现代性”的时代坐标上，用什么样的思想范式去解读和诠释纷繁复杂的“现代现象”，用什么样的思维立场来建构“现代学”的中国范式，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的新课题。

“现代学”作为对复杂“现代现象”的理论说明和思想建构，并不是现代“学科门类”意义上的具体学科，而是具有极其复杂性和广博性的跨学科论域。范畴是思想叙事的具体表达。“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1] (P601) 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结构以及现代性生成中结构性变迁的特殊镜像，单一的学科范式对其难以有效诠释。西方知识界动员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展开综合性的研究，历时性地形成这一具有复杂知识结构和多维思想范式的学问。从这一意义上说，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由理性精神支撑的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尽管是偏重自然科学之于“自然现象”的规律性揭示，但无不是对“现代现象”之不同侧面的规律性说明。基于理性意识和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尽管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但它们对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研究也涉及对人类社会及其各个部门领域的理论说明。作为专门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基本面上都可以视为“现代学”的分析范畴。纵观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主题，无不是对人类存在及其对象性关系的理论说明。当现代化叙事直接指向“人的现代化”时，基于对人的各种学问也就成为构筑“现代学”的主干，其他社会科学则视为这一主干的分述。

以上是基于“现代学”之一般规律的问题域分析。在此，还有必要引入一个对象性坐标来展开具体分析。现代是与传统相对应的叙事范畴，二者是具有特定时间意识和空间叙事的概念总体。离开传统言说现代，现代则无从说起。抛开现代谈论传统，传统则不知所向。在主客二元思维的影响下，人们一度将二者割裂开来，并视为两种异质化的“事物”来把握，最后导向了现代性叙事的历史虚无感。“把一切前现代化的东西都归之于‘传统’，事实上抹煞了不论其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都存在极大的特殊性与多样性。”^[2] (P41) 传统与现代原本统一于以人为核心的历史创造和历史叙事的概念界

分。现代亦称当代，即作为思想在场意义上的时空坐标和时间意识。在古人和前人的视野中，他们赖以生存的时空场域就是其认知意义上的“当代”，而在今人看来则是过去式的“传统”。适如《庄子·齐物论》之“今日适越而昔至也”，“今”“昔”总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观念和历史意识。今人所处的“当代”作为当下的“现实”和时空意识，是联结过去与未来的时空界标。在这一意义上说，传统与现代在人类创造历史之实体存在的意义上并非断裂或割裂的，甚至可以说“任何现代社会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现代性社会，而是现代性与传统性兼而有之的社会”^[2]（P40）。现代性和传统性不是判断文明优劣的根本标尺，而文明本身是具有历史意识的历史性范畴。朝向人类进步意义上的文明具有主动创造自身、反思和修正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尽管具有“现实”的时空镜像，但由于自我矛盾而不具有反思和超越自身的能力，诚如“工业社会的基本轮廓刚刚从西欧的地平线上升起，关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前景就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评论”^[2]（P28）。也就是说，“并非每种历史都具有历史性，只有当一种历史拥有开拓未来性的能力时才有历史性，否则只有过去时，即使继续存在，其现在进行时也是过去时的复制，还是过去时。”^[4]西方“现代学”在知识诠释和话语叙事上走向“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以一种封闭式的普遍性而向后发现代化国家昭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终结论”。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16]（P348）事实上，传统作为代代相传的“事物”本身在不断的创造中，通过时代精神的灌注并融入到未来性的历史创造中。阿诺德·汤因比认为，“未来在真正降临之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此，我们只有通过观察过去才能找到未来的智慧之光。过去的经验是我们得到关于未来智慧的唯一途径。”^[17]（P3）人们走进历史，不只是为简单地复盘曾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家园，更是为了“鉴古”而“通今”，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属于“当代人”的“现实”和“未来”，即以历史性视野实现社会进步和文明进阶。置于人类历史存在的主体视域上，人是历史的产物和创造者，也是作为历史性的存在，是具有历史意识并能够创造新的历史的存在主体。西方“现代学”的知识论证逻辑存在一个先天的思维盲区，以断裂化之主客二分的方式来阐释人类社会进程中的“现代现象”，由此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拔地而起”的文明存在论，是人类置身“当代”境遇必须面对且正在建构

的生存式。这一生存式集中体现在现代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叙事中。

西方现代化国家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发起者和创造者，经历了从反抗传统走向现代的思想历险，经历了科技革命及其哲学话语的自我建构，经历了现代社会制度及其观念形态的理论确证，应当具有“言说”现代性的主体身份和历史合理性。在数百年的“现代化实践中塑造的文明形态凸显了科学技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的价值，呈现了超越传统文明形态的理性化过程，使文明重塑成为每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的普遍命运”^[18]。这一作为在场者的主体分身以及作为创造工业文明的普遍性叙事，使西方现代化国家以知识论意义上赋予“普遍性”的诠释权。在“现代学”前面加上“西方”一词的内涵规定，也就直接体现“现代学”的身份标识。然而，在“知识形态”上隐去“西方”一词的修饰，重在表达现代性的“普遍性”，尤其是西方“现代学”在人类发展叙事中的普适性。20世纪以来，关于“普世价值论”“普适价值论”“文明冲突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共生论”“依附—不发达论”“后发—从属论”等现代性话语范式，作为对“现代现象”的理论洞察，大多是基于西方知识论在议题设置上的“同一性”。其核心逻辑是“把现代化的世界性进程解释为传统社会向着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模式（西方社会）发生单线式渐进变化的过程”^[2]（P41）。作为后发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中的历史逻辑、文化传统、实践进程、地方知识，则是用来被诠释或理论规定的对象。在普遍主义叙事的“强现代化理论”看来，人类现代化叙事在“知识形态”上是一元或同质的，并通过论证“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特征来强化现代性的一元性，其他民族国家若离开这一认知框架和实践范型去探索“一体多元”的现代化道路，就被视为脱离全球化进程的“离群索居”的局外者，不被视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作为现代国家的主体身份和主流群体。

任何一种理论范式和实践范型都有其问题域和功能限域，当其成为反思的“对象”时，也就意味着该范式和范型需要被重新理解和再建构。现代学科分化（分门别类）固然是对部门领域问题展开具象化研究的必要，但片面性也成为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科学的问题之一。之于人类现代化规律的知识形态研究，既需要深入政治史的分析，更需要展开思想史的抽绎。“如果说，政治史更多是在大量的事件、人物活动和各种机遇中展现出历史规律和阶级斗争的必然和偶然，政治史应该更多在史实的详

尽活泼栩栩如生的剪裁记述中，来看出历史发展的生命和趋向；那么，思想史则将以更直接更赤裸也更枯燥的逻辑形式来表现出必然。”^[19]（P484）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本身是复杂化的，世界上诸文明体系（形态）都存在多样性的生发源头，客观上存在一个从“多”归于“一”的复杂性演变过程。针对现代化叙事的“同质化”倾向和“普遍性”逻辑，“后殖民主义”“后工业化”“后世俗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促使“后现代性”的勃兴。基于“现代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来自不同“问题域”的知识论证为认知这一复杂现象提供了必要的分析视角，但由于对“对象域”的非整体性把握而无以总体求解。

现代性之“一体多元化”源自人类走向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平衡规律。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20]（P81）之于“现代现象”本身的复杂性，需要以“古今中外法”来求解“古今中西问题”。这一方法论在哲学意义上可以表达为“以世界为场域，以历史为向度，以文明为坐标，以中国为方法”的总体历史思维。其中“以中国为方法”不是狭隘意义上民族主义本位，也不是空间之争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本位，而是朝向文明进阶的包容性发展思维。“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21]（P131）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中国式”不限于“现代性在中国”的主体身份和场域说明，也不限于现代化之“中国特征”的内在规定，而是基于中国创造和文明进阶的思想叙事。“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现代性”之外寻求现代化道路，而是基于对西方“现代学”之普世性（“普遍性叙事”）批判而探索人类现代化的多重内涵，即在现代性之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探索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多元进路。亦如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将“文明生长”喻为“岩石攀登者”，“攀登人”尽管都是独自在探路“攀登”，但是所有人都是从属同一项事业。此外，关于“一元

多体”的另一个比喻是关于“播种者”的寓言：“播下的种子都是一颗颗单独种子，每一颗种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然而，所有的种子都属于同一类的种子，都是一个播种者播种的，都是希望有所收获。”^[22]（P242）人类现代性事业具有“一元性”（作为类的“种子”），而各民族国家以何种方式走向现代化则是基于特定历史逻辑而表现出来的差异化命运。这就意味着，在思维认知上摆脱“平行论”的前提预设，即将现代化事业的主体分为“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将现代化的进程分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将现代性的程度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具有“知识论”的前提预设掩盖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之于“历史科学”建构“世界历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规定。质言之，“平行论”的思想立场是将社会制度形态的“递升结构”软化为一种“平行化”甚至是“依附性”的关系坐标，不愿意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解放的文明进阶。基于“一体多元化”这一思想基础和未来视野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其意旨不在作为总体性“现代学”之外另起炉灶，而是直面“现代现象”之正在生成的“世界历史”场域，以开放包容的心怀历史性地占有人类现代化的积极成果，以文明进阶的历史主动意识探索重撰“现代性”的中国思想范式。

于此，作为诠释人类发展叙事的开放性的“现代学”，通过从“西方范式”到“中国方法”的内涵引入和思想孕育，在文明进阶的未来向度上形成“现代学”的中国思想范式。这一意义上的“中国式现代化思想”，既是中国参与现代文明创造坐标意义上的“现代学”，也是“世界历史”生成意义上的未来向度的“现代学”。这正是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来深度诠释“现代现象”的思想坐标，也是置身于现代性场域以历史主动意识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意义向度。“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作为“现代学”的历史叙事和文明进阶，其历史意义不仅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主体性的知识诠释，也为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提供了兼具道义和真理的思想之光。

〔注 释〕

① 牛津《社会学辞典》将“卡尔·马克思”定位为“德国社会理论家，革命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社会学的开创者。”参见〔英〕

约翰·斯科特，戈登·马歇尔主编《社会学辞典》（第4版），陈云松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823页。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9.

- [2] 罗荣渠. 现代化新论: 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3] 赵义良.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模式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5, (7).
- [4] 赵汀阳. 历史性与存在论事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 (7).
- [5] 丁耘. 儒学与启蒙: 哲学会通视野下的当前中国思想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 [6] 赵汀阳. 方法与问题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3.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十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五卷)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25.
- [9]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五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九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四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6]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M]. 陈高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17]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变革与习俗 [M]. 吕厚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 [18] 殷峰宇.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底蕴及其世界历史意义 [J]. 哲学研究, 2023, (1).
- [19] 李泽厚.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20]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1] [日] 沟口雄三. 作为方法的中国 [M]. 孙军悦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 [22] [英] 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 [M]. 郭小凌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Creative Logic to the Though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Narrative of Chinese Modernism and Its Civilization Advancement

LIU Zhan-h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PRC)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deology is knowledge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firmation to the modern phenomena. Since the modern times, China has integrated into the process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historical change, and formed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ought. Its creative logic includ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cognitive understanding has gone through a temporal and spatial expansion from time consciousness to historical thinking, so as to create a holistic narrative of civilization in the future. Secondly, it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progr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with human modernization as the value goal by establishing the overall connotation of modernity in the construction logic to replace the singular approach. Thirdly, it is committed to establishing a broad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in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advocat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aradigm of Chinese thought. Historical practice has shown that Chinese modernization create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modernization thought 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It is not only reflected cognitive modernization in the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thinking transformation. In summary, its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lies in opening up a new narrative style b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analyze modern practical models and ideological paradigms.

[Key words] modernity; modernism; Chinese modernization; spatiotemporal coordinates; historical thinking; knowledge form

(责任编辑 曹亚斌/校对 严冰)